

赵逵夫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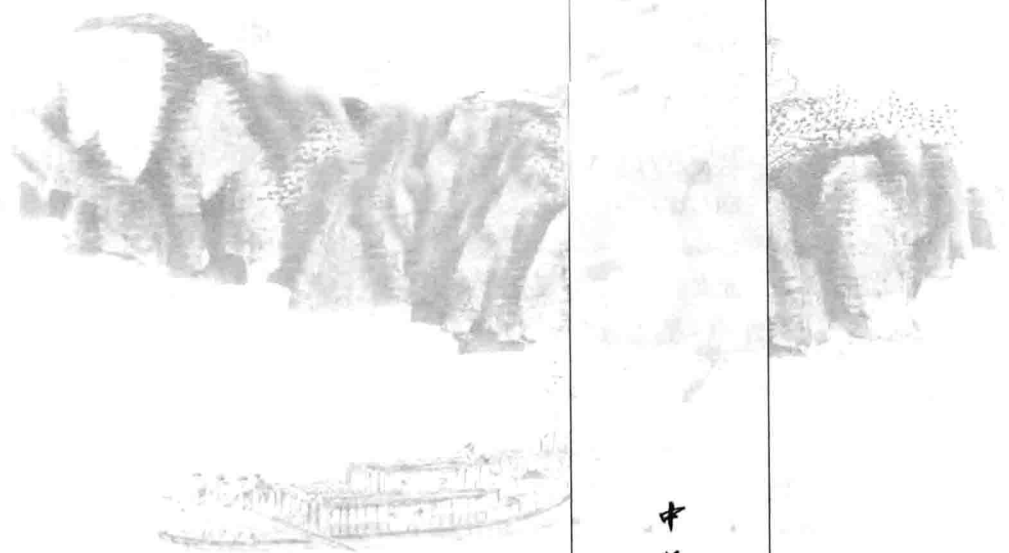
读赋献芹

中华书局

赵逵夫 著

读赋献芹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赋献芹/赵逵夫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4. 10
ISBN 978-7-101-10412-7

I. 读… II. 赵… III. 赋—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0890 号



书 名 读赋献芹
著 者 赵逵夫
责任编辑 俞国林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½ 插页 2 字数 28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0412-7
定 价 68.00 元

序 一

许 结

我与赵逵夫教授相识于 1990 年秋在济南召开的首届国际辞赋学研讨会上,时赵先生正值中年,为学界“中坚”,于辞赋研究亦然;我是这次会上最年轻者,虽非初出茅庐,亦仅有待携挈的学界“后备”,先生不弃,一见如故,言学论文,常在坐谈与行山间。而当时说到我校辞赋研究前辈郭维森教授,赵先生因与之多有交往,颇见肃然敬仰意,以为道德文章,忠厚长者。几年后,我与郭先生合撰之《中国辞赋发展史》刊行,赵先生获赠后即刻邮购若干,发给他所在校本专业同仁人手一册,其与郭先生的学术情谊可见一斑。我见赵先生亦有同感,其为人治学,皆令我心仪钦慕,且二十年来先生宏文巨著,光耀学界,拜读之后,亦每每叮嘱自己的研究生认真修习,获益良多。

谈到治“赋”,我曾借用古人话构成三境界说:先则刘勰语“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胸襟开阔,气象博大,此第一重境界;次则魏收语“会须能作赋,始成大才士”(《北史·魏收传》引),因才辨学,驾驭群文,此第二重境界;后则班固语“多识博物,有可观采”(《汉书·叙传》评司马相如赋),广征博采,厚积薄发,此第三重境界。据我所见,当今治学论赋者,赵先生得此三重境界,可谓全矣。近观赵先生论赋新著《读赋献芹》(以下简称“赵著”),尝鼎一脔,可知其味。具体而论,兹申述三点浅见如次:

首先,赵先生论赋视域广大,其研究成果有新建赋史的意义。古人论赋,如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之言“殷人辑颂,楚人理赋”,“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等,皆由源及流;至唐宋以后,赋体多元,学者辨体归本,大倡“祖骚宗法”之说,乃由流溯源;而这两种方法,恰天衣无缝地交织于赵先生的赋论中。缘于由源及流,赵著由先秦赋、两汉赋、魏晋赋、南北朝赋,以及唐宋明清,均有论述,表现出以赋论构建赋史的功用。相比之下,也是值得注意的,赵著尤重由流溯源,所以研究功夫更集中于先秦、两汉赋的研讨,特别是对赋体本源的考论,最为显著。也正因此,赵先生主编了七卷本《历代赋评注》,并在《后记》中提

出了三个针对,即针对研究重理论而轻文献,针对重视重点作家而忽略面的拓展,针对学术化明显而普及性不足。三个针对,正是三重纠正,使赵著开拓视野,改变以往赋史的褊狭,而将出自《说苑》、《逸周书》、《新序》等杂史著述中的篇章,例如《五指之隐》、《太子晋》等纳入赋域,以阐发其历史地位,无疑发展了姚鼐《古文辞类纂》的赋学观,而有了突破前贤的新建树。

其次,承续前述构建赋史,赵著视域拓展又在于论赋落实于“文体”,而论“文体”又必落实于“文本”,考索语言,还原文本,是其具体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在这一方面,赵著中对《荀子·赋篇》、枚乘《七发》、《梁王兔园赋》诸作的考论,既细研其微词,又提摄其义理,见解卓异,自成其说。然尤可贵者,我以为是赵先生落实于“赋”的语言艺术的新探索。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万曼即有《辞赋起源:从语言时代到文字时代的桥》,以语言学原理考量赋之文本,意义重大,然其限于抽象论述,未能深入。今读赵著,同样以语言学原理衡赋,但却考述具体,体悟深切,如对前述杂史中诸篇章“赋体”的确认,又如对《国策》中的《对楚威王》和《晏子春秋》中的《景公饮酒不恤天灾》等“赋”文的分析,内蕴赋体的“铺陈”与“隐语”,并从词章结构着眼的逐层解读,结论令人信服。

再者,考论结合,新见迭出,是赵著的又一特色。本书收赵先生论文21篇,主要是三类:一是探源,即赋源论(如《赋的特质及其与汉语和中国文化之关系》),兼及赋体(如《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二是述史,即赋史论(如《汉王朝的兴衰与汉赋的发展及转变》);三是考证,其中或赋家,或赋作,或兼而有之。然论其性质,则亦有三:一曰重理义(如《〈七发〉体的滥觞与汉赋的渊源》),一曰重注疏(如《〈韩朋赋〉校补》),一曰重章句(如《〈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仅此,也可见姚鼐所说“义理”、“考证”、“文章”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述庵文钞序》)的学术原则,在此已得到一体的显现。当然,赵著中精彩分析与精审考论,其中新义读者自见,无须赘述,然则如《论瞽矇、俳优在俗赋形成中的作用》、《汉晋拟人故事赋钩沉》等文章,还是应该推介并引起关注的。

玄觉禅师《永嘉证道歌》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观学之道亦然,一月可摄万千水月,学者一篇文章,往往即可见其质性品格;然无“一切水”又难显一月化万千水月之壮丽景观,学者平生素学,又是研究其某一成就不可或缺的背景材料。读赵先生新著,我以为还应当关注两点:一是学术背景,即先生诸多论著(如《屈原与他的时代》)和编著(如《历代赋评注》),正是其新论之“月”得以普现的“一切水”;二是理念,赵著虽属文章汇集,其中也不乏题序之作,然雅人无俗语,散论中时见精深,这在于严谨的学术理念,此亦赵先生文章

中的“水月”归于“一月”的意义。

赵先生兼任全国赋学会顾问，每有新著，尝惠赐予我，今嘱为序，委实不敢，谨赋长句以贺：

大汉文章赋史昌，两周学术耐思量。
皋兰月上秦川地，梦笔华生纸价昂。
考义孙卿明义理，倾心屈子辨心香。
宏文一卷开新境，纵目云天百鸟翔。

2012年10月2日

（许结：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赋学会会长。）

序 二

万光治

我与逵夫结缘，缘于辞赋研究。逵夫长我半岁，晚我一年硕士毕业，其学术成就却令我不可望其项背。他的硕士论文《屈原生平考辨》新见迭出，多有发明。其中《屈氏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兼论三闾大夫的职掌》一章因解决了屈原研究两千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获得学界耆老汤炳正、张震泽等先生好评，被认为是楚辞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由于楚辞为汉赋的不祧之祖，逵夫顺理成章地涉足赋学领域，我才有幸在1990年首届国际赋学研讨会上与他相识，并自此视他为自己的学长。

逵夫作学问，基础深厚，视野开阔。他大学毕业，躬逢“文革”，却在工作之余，开始关注乐府诗歌、宋前戏剧、敦煌文学，为日后自己的步入学术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1982年硕士毕业以后，他更系统地研究了《诗经》、《楚辞》、《周易》、先秦散文、敦煌变文、西部神话、氏族史前史、宋前戏剧史，出版《屈原与他的时代》、《屈骚探幽》、《先秦文学编年史》，完成汉简《孙臆兵法》补校。2010年，逵夫利用自己在历史、文学、民俗、文献、文字、音韵、训诂等学科之所长，主持完成并出版赋学巨著《历代赋评注》。该书选文精审，注释翔实，评说经典，在同类著作之中，堪为典范。目前，他和他的团队正从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编纂整理与研究，这也是赋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程。

逵夫的《读赋献芹》收录历年赋学论文，内容颇有分量，书名却很谦逊，其中既有宏观的考察，也有个案的研究。宏观的考察颇能高屋建瓴，切中肯綮。如论赋体文化特质、来源，他认为，赋的体制、表现手法与汉语的特征、中国传统的哲学、美学思想乃至中国古代的文化精神密切相关，是中国特有的文体，因而不可能用西方通行的文体观念予以分类和规范。在他所确立的四种赋体中，文赋应为主体。“论赋之发展，主要是论文赋在结构方式、语言风格上的变化，兼及其与骚赋、诗体赋之间的相互吸收与消长。骚赋、诗体赋本身不是没有变化，但大部分时间中被边缘化，不占主流，所以也影响较小。”赋体在各个历史阶段的

新变或“复古”，除了与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潮相关外，也体现了作家希望超越前代的艺术追求（《论赋的特质及其与汉语和中国文化之关系——〈历代赋评注〉序》）。又如论南北朝赋的创作得失，他认为从东汉开始，赋逐渐转向抒情，其审美功能逐渐增强。特别是汉魏六朝时期的赋，虽不及汉大赋的题材广泛，能多角度观察社会，但汉魏六朝赋侧重于作者在不同境况、不同遭遇下的情感的反映，兼以作者能充分发挥汉语的表现功能与审美功能，因而具有了心灵史的意义。相比“润色鸿业”、歌功颂德的汉大赋，汉魏六朝赋中一些篇幅较小、抒情意味浓厚、描写细致传神的赋作更能感动读者，更易让人接受。南北朝是辞赋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诗赋互渗及赋进一步骈化的时期。此时的赋作，不管是在开拓文学的题材方面，还是在深掘语言的艺术表现方面，都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南北朝赋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文学本质之深化（《南北朝赋创作的得失》、《汉魏六朝赋点评前言》）。一个“心灵史的意义”，一个“文学本质的深化”，把汉魏与六朝赋体文学的特点与成绩，评说得恰到好处。观以上逵夫所论，涉及赋学研究的若干关键问题，没有中国古代文学的宏观视野以及相应的理论高度，不可能做出如此精要的结论。

透过逵夫于辞赋个案的研究，尤能见出其文史结合，探究历史真相的用心。如其论说《七发》的创作背景、创作过程、创作动机及其构思的特点，皆有不同于前人的新看法。在此之前，学者虽然也注意到汉初藩王拥地自大的背景，但基本依据《六臣注文选》，将《七发》中的“楚太子”与“吴客”视作假设人物。逵夫却说，高后之时，楚元王太子辟非有病，“吴王濞派其门客之年轻博学而善于文辞者去问候并以谈说解闷，是情理中的事。”后吴王濞对朝廷生怨恨之心而图谋不轨，“但此时吴王濞只不过有所谋划，尚未至决心铤而走险的地步；所表现出来者，只是称病不朝。我以为，《七发》之作就是在这个时期。枚乘以前有过的自己的前往楚国问候楚太子之事为由头，企图达到正面劝说开导吴王的目的。”故《七发》中的“楚太子”、“吴客”云云，并非枚乘的向壁虚造，而是借此暗射汉初吴楚两国的政治现实，并借事设喻，对藩王予以规劝。《七发》的主旨与枚乘两次上吴王书的思想一致；枚乘以向太子进“要言妙道”为“语端”，采用文内文外结合的办法，最终向吴王谈论的是政治上“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的道理。又如《论〈两都赋〉体制及影响》，其文虽然主要论述《两都赋》体制形成的过程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但逵夫同时也指出，汉代的都城赋有两种体制，一种以班固的《两都赋》为代表，由两篇作品组成，两篇在内容和结构上有一定的联系，分则为二，合则为一；一种则独立成篇，以傅毅的《洛都赋》为代表。把汉代京都赋概括

为两种体式,此前未曾有过。在《读赋献芹》中,逵夫对荀赋、《梁王兔园赋》、赵壹、陆机、李谐及其《述身赋》乃至《韩朋赋》、《西藏赋》等,或有翔实而令人信服的考辨,或有独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其学术的价值除在结论本身,论证的过程更能给人以启示。

笔者在拜读《读赋献芹》之后,感触最深的,是逵夫治学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他在传世文献而外,对于出土文献、口传文献、历史遗存乃至民俗文化遗存,皆能纳入视野,加以综合的考察与判断,从而使其研究具有罕见的广度和深度。例如他考察赋体的起源,对于俗赋之存在、作用,便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此前学术界一般从《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探寻赋体来源,而于《国语》所云“瞍诵矇赋”,往往只是视为传播形式,而未注意到其所蕴含的文体意义。此外,对于荀况《赋篇》,论者虽然以其具有民间说唱的性质而将其视作赋之一源,却未能对民间说唱的原型作进一步的探究。其实,史载瞍矇所诵,除了可供吟诵的民间乐歌,还有可供口诵的民间俗赋。而后者以其口诵的性质,给瞍矇所诵留下语言与文字的印记,且自此深刻影响到赋体语言风格的形成。瞍矇将口诵的艺术带入宫廷,不仅所宣讲的内容受到朝廷与文人的重视,其表现的形式也逐渐为文人所吸纳和借鉴,荀赋即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标本。随着此后语言文学艺术的发展,它更渐次纳入《诗经》、楚辞、先秦散文的某些文体因素和艺术特质,从而形成后之所谓诗体、骚体、文体的赋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无论上述哪一种赋体,都仍保持着口诵的特点。从汉太子听了王褒等人的赋诵而病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诵赋至少在西汉,还是可以诉诸唇吻且给人以美感的艺术形式(《汉书·王褒传》);从孙绰自誉其《游天台山赋》掷地有金石之声(《晋书·孙绰传》),也可以肯定至少在崇尚文辞华美典雅的六朝时期,赋依然可以口诵,听者仍能从中获取美感。可以口诵并给人以美感,说明当时的辞赋使用了大量生动的口语。对声音的形象模拟和对状貌的生动描绘,是口诵文学借以吸引人的必要手段;形声字和会意字的重叠使用,乃成为口诵文学的一大特征。后人所见辞赋用词的繁复乃至艰涩,是因为口语随历史而湮没,留下的只是文字的躯壳。没有了口语的支撑,后人见到往古的文字躯壳,赞赏者以它们为密丽典雅,并自此认为所谓的辞赋,密丽典雅乃是其当然的形态;贬斥者以它们为繁复艰涩,并自此认为所谓的辞赋,繁复艰涩乃是其本来的面目。这两种误会,其实都忽略了辞赋的最初传播途径不在案头,而在唇吻。遗憾的是我们今天说到辞赋的传统,很容易忘记其语言的初始形态其实与俗赋同源,完全可以用于口诵。上述误会导致赋之三体,长期成为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赋体分类。因为如此,逵夫在

此基础上更别出俗赋一体,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逵夫分赋体为四,初看似有跨越范畴之嫌,因为前三者明显属于文体的范畴,而俗赋之俗,大抵表现在题材和语言,应属风格的范畴。但仔细考量,俗赋的题材、语言乃至结构的特点,既关乎风格,更关乎文体,逵夫将它们与诗体、骚体、文体并列为四,其实很有见地。

笔者以为,在本书所录《赋的特质及其与汉语和中国文化之关系》、《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论瞽矇、俳优在俗赋形成中的作用》、《汉晋拟人故事赋钩沉》、《韩朋赋校补》等文中,逵夫依据大量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参酌俗文学之特点,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为赋体研究的深化提供了两个重要的成果:

其一,确定了先秦俗赋的赋文学史地位。逵夫认为,学者讨论赋体源头,有的认为来自行人辞令,有的据“赋者,古诗之流也”及“赋者,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概念空泛加以推论。他自己则根据汉赋已经定型的几种体式,分别溯流讨源,指出骚赋、文赋、诗体赋和俗赋在战国之末都已形成。作为赋的主体的文赋,过去学者们或以为出于诸子,或以为出于行人之官,其文本来自议对和行人辞令。但逵夫认为,上述应用文字转变为文学的一种形式,皆同瞽矇赋诵的艺术活动有关。是瞽矇选择有意义的议对和辞令,整齐其语言,使之更便于赋诵,从而促成了赋文学体裁的产生。逵夫还认为,《国语》所记虽然全为春秋时人的语言和行事,且传说为春秋末年的左丘明所编。但“从汉语的语法、词汇的特征和中国美学思想的传统说,可以追溯至春秋时代以至更早,但这只是指赋在结构上和语言上的要素而言,赋的形成期,我们只上溯到战国中期”(《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逵夫所论,对于探寻赋的初始形态及其形成时期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除文献所载瞽矇故事之外,逵夫还认为先秦时期较早的赋体作品与典籍所载师旷以及俳优很有关系。“先秦两汉文献中师旷的几篇言论,多句子整饬,讲究对偶、排比,同莫敖子华《对楚威王》一样,具有赋的特征。”俗赋的题材则取自寓言和传说故事,它的形成同以表演、说笑愉悦人主和贵族的俳优有关。战国时淳于髡所编《晏子春秋》中有不少近于俗赋的作品,有的甚至传至汉代以后,在唐代俗赋作品中也有所反映(《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逵夫还在《俗赋研究序言》中说,过去探讨赋的起源,只是由“赋者,古诗之流者”、“不歌而诵谓之赋”、“赋,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等一些定义去推衍,未能揭示出赋形成的原因。实质上,先秦时期的瞽矇、俳优对赋特别是俗赋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论瞽矇、俳优在俗赋形成中的作用》)。

其二,梳理出了俗赋自先秦至唐的发展线索。逄夫认为,俗赋是自敦煌文献中发现唐代《晏子赋》、《燕子赋》、《韩朋赋》后,才为学者所注意的。但若上溯其源,俗赋的产生可以提前到西汉,甚至是先秦。敦煌发现的《燕子赋》、曹植的《鹞雀赋》和连云港所发现《神乌赋》这类俗赋,不仅具有情节性,基本上用代言体,而且也都用了拟人的手法。这类代言体俗赋,由《庄子·秋水》中的《夔蚘相怜》、《坎井之蛙》类寓言而来,追溯其上源,则有《诗经·豳风》中的禽言诗《鸛鸣》。《史记·龟策列传》中的《宋元王与神龟》在构思上、形式上、语言上已具拟人故事赋的特征。今存扬雄《都酒赋》、傅玄《鹰兔赋》、卞彬《虾蟆科斗赋》虽不完整,却能证明这类俗赋西汉至唐一直存在的事实(《汉晋拟人故事赋钩沉》)。逄夫钩沉此类赋作,不仅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发展线索,而且再次强调了俗赋在中国赋体文学中的地位;它与文体、骚体、诗体赋并列为四,是当之无愧的。

基于以上认识,逄夫对其学生伏俊珏的《俗赋研究》一书给予很高的评价:其一是“从目录的方面对汉以前俗赋存在的状况作了很有意义的探索”;其二是“根据俗赋特征的几个要素及《汉书·艺文志》中‘杂赋’的内容和汉代人关于赋的论述,大大拓展了研究的范围”;其三是“对敦煌遗书中的俗赋和近于俗赋的作品进行了考论”。故“这部书的出版无论于赋学研究、俗文学的研究、还是于敦煌文学的研究,都会起到推动的作用”(《论瞿瞿、俳优在俗赋形成中的作用》)。因有逄夫对俗赋的重视,一个以俗赋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梯队已经形成!

2004年我到甘肃采风,行前,朋友说甘肃遍地是宝,万勿空手而归。8月20号我在岷县采集花儿,晚上休整,与在兰州的逄夫通话问候,且告诉他我采集民歌的意图与计划。不料逄夫听了以后很是激动,一再叮嘱我第二天务必去他的家乡西和,那里有为期七天的乞巧节,正好第三天开幕。因有逄夫连夜为我跟县里联系,我以后的工作非常顺利,收获之大,出乎意料。经历了在甘肃的采风,我相信了朋友“甘肃遍地是宝”的说法:除了地下和地面的文物古迹,在甘肃淳朴的民风民俗中,还有深厚而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如今之西和(古之仇池)的乞巧节,便是古代女儿节的活标本;至今仍流行于榆中县青城乡的小曲,亦可看作戏剧的雏形。数年以后,我把主要的精力从辞赋转向采集、保存与研究原生态的民间歌谣,实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雅文化到俗文化的转化。从现象看,这个转化的跨度很大,但文人辞赋的源头是民间讲唱,文人诗词曲的源头是田野歌谣,所以我的新工作并非改弦易辙,不过是沿着以往的学术方向进一步探本溯源罢了。向古代文学的苑囿跨到门外,与民间文化亲密接触,不经意间再回头向古代文学的大门望进去,突然发现有好些问题,过去不曾想到,现在却

有了新的认识。但我的这一觉悟,在逵夫却早已是自觉的行为。从俗文学的角度关照辞赋的源流和特征,仅仅是逵夫努力拓展自己研究层面与转换角度的一个方面。他曾经在父亲赵子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形天神话与氏族和陇南文化的关系,并对甘肃西和、礼县的七夕风俗与秦文化的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他还将其父收集整理的乞巧歌加以校订,编成《西和乞巧歌》出版,不仅对于地方俗文化的保存与研究做出贡献,更昭示了继《诗经》、《乐府诗集》、冯梦龙《山歌》之后,当代学者在俗文化的研究方面仍然大有可为。逵夫能够在赋体文学的研究中别开蹊径,显然与其对俗文化研究的重视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是分不开的。

刘熙载说“赋兼才学”(《艺概·赋概》);方师铎《传统文学与类书的关系》详细论述了赋文学与类书形成的关系。可见在中国的各体文学之中,赋体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涉及更多的要素,其“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内容也使它几乎具有百科全书式的性质。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研究者应该具备的素质;尽可能合理的知识结构与尽可能广阔的研究视野,是赋学研究质量的根本保证。原全国赋学会会长马积高先生除赋学研究外,在荀学、文选学、宋明理学、清代学术思想等的研究方面皆有可观的成绩,故其《赋史》一书在赋学界能有里程碑的地位。逵夫的学术成果及其即将出版的《读赋献芹》,亦证明了赋学研究者应该具备的学术修养,以及永不故步自封的学术品质。

是为序。

2013年2月19日

(万光治: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赋学会名誉会长。)

前 言

上中学的时候读《古文观止》，对其中所选杜牧《阿房宫赋》、欧阳修《秋声赋》、苏轼《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很是喜欢，皆熟读能诵。上大学以后，因朱东润先生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两册刚出版，用为教材，其中有贾谊的《鹏鸟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等赋作十多篇，于是对骚体赋、骋辞大赋、骈赋和宋代的散体赋的各自特征有了一点了解，也弄清楚了汉代辞赋同楚辞的关系。后读当时出版不久的瞿蜕园先生的《汉魏六朝赋选》，甚感兴趣，又找《鲍参军集注》、《庾信诗赋选》和《六朝文絮笺注》读了一些。工作以后，对赋也一直喜爱不舍。近几十年中，我的主要精力在楚辞研究方面，也要考察楚辞对后代文学的影响及影响到楚辞文体在后代演变与传播的各种因素，所以一直对赋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汉以后骚赋继承楚辞传统仍然重在抒情，由《三百篇》演变而来并继承了屈原《橘颂》和荀况五首《赋》（见《荀子·赋篇》）的体制与风格的诗体赋则是借咏物以明志。但这两种体式在汉代以后都不是赋的主体，作为赋的主体的是文赋。故元代祝尧《古赋辨体》论赋之体制多言“古赋”、“俳体”、“律体”、“文赋”，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将赋分为“古赋”、“俳赋”、“律赋”、“文赋”四类，而均将“楚辞”另列，汉至宋的仿“楚辞”之作附于后，不在赋的范围之中，只是论赋之源头时言及。将诗体赋、骚赋排除在赋的范围之外，自然欠妥，以“文赋”只指唐宋时代古文运动之后兴起的散体赋，而将与这种赋没有多大区别的战国、汉代之作称作“古赋”，也缺乏历史的眼光。但这个看法也反映了一定的事实，那就是：文赋是赋的主流。

我觉得，以文赋为主体的赋作吸引人的，主要不在情节，不在场面描写，更不在人物刻画，而在语言。无论小说还是记叙性散文，都以能生动、清楚地描述出事件的发展过程，展现当时细节与场景，让读者头脑中产生想象，如身临其境，亲闻亲见，此为最高水平。赋的创作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同样要求具有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赋却更侧重语言本身的表现美。所以，赋除了带动读者的

艺术想象之外,更侧重通过语言表现来感染读者。可以说,小说和辞赋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发挥、调动、挖掘着语言的表现功能。赋和诗一样,在驾驭语言上,把汉语潜在的美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而且在表现上比诗更自由,更少束缚;作者以其深厚的语言素养、灵动的笔触,在自由变幻之中,显示着汉语的美。

1949年以后的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近三十年中,就中国大陆而言,赋是各种文体中最受冷落的,因为除敦煌佚书中发现的俗赋之外,赋全是文人之作,也很少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很快,这些东西不能读了,文赋中的骋辞大赋、骈赋、律赋全是“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骚赋全是“没落文人消极情绪的倾吐”,诗体赋是“封建文人反动意识的体现”,全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那些年头,只是偶尔在灯下读读而已。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文艺界、学术界真是一片春光明媚,将近三十年时间中受到冷落的赋,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很多研究赋的著作问世,港台一些学者的赋学著作,也先后被介绍进来,赋学显示出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

虽然这样,我觉得新时期赋学范围之中,研究性著作多,而包容较广的注本少,对赋作从文献角度进行校订、注解、评说的少。赋的研究著作中,通论、概论类著作较多,而对一些作家、作品的关键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较少。所以,二十多年来,我对赋的研究侧重两个方面:一是对一些代表作家,对汉魏六朝时代一些重要作品文本方面的问题作了些研究,虽然有些作品如《七发》、《两都赋》等都有很多人写过文章,但有些问题实际上并未解决,还有一层遮蔽着我们视线的布幔并没有被揭开。《〈七发〉与枚乘生平新探》、《〈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是对人们最熟知的两篇大赋中以往未能解决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我以为由此这两篇赋中一些令人迷惑的问题可以排除。《梁王兔园赋》黄侃曾作过整理,但距恢复原文的基本面貌使能顺利阅读尚远。我对它作了校理,应同原作差距不会太大,读者可借以了解其内容与大体结构。《汉晋赋管窥》校理了贾谊、班彪、崔骃、蔡邕、傅玄、孙绰的几篇赋,大体都是名家名篇。《读陆机赋札记》、《韩朋赋校补》属同类之作。

另一个方面的工作,便是主持了《历代赋评注》的编选、评注工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决定编一部把历代重要赋作都收罗在内的选注本。这样,在一般的普及选本的基础上,给想步入赋学领域的青年学者提供一个进一步扩大阅读范围的读本,为他们能顺利地进入赋学领域并打好较坚实的基础提供方便,以避免研究领域脱离具体作品的互相转述、架空立说,也使赋的普及同古代诗词、古文一样内容丰富,普及面较宽,向一般赋的爱好者展开一个更广阔的历

代赋作名篇的天地。从1993年初我同本校几位老师开始《汉赋评注》等《历代赋评注》各册的编选工作,到1995年完成《汉赋评注》、《魏晋南北朝赋评注》、《唐五代赋评注》和《明清赋评注》,由于出版中的曲曲折折,到新世纪初我们又作了充实、修订,并完成了“先秦卷”,将“魏晋南北朝卷”分为“魏晋”和“南北朝”两卷,共七卷,于2010年2月出版,共收332个作者的574篇赋作。各卷的篇目,我们都认真研究,不因有的作家有注本可参而多选,也不因一些重要作品文字难懂且没有人作过注而不选。我们也特意作了些挖掘工作,使一些有较重要的认识价值或文学价值而前人较少关注者不至于遗漏。《论李谐及其述身赋》一文便体现了这一点。“先秦卷”自然要收楚辞中的作品,但《九歌》和《天问》没有收,因为它们明确是歌和诗(有的辞赋选本和辞赋鉴赏辞典中收入)。

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赋也确实是包括帝王将相、后妃女史在内的上层统治阶级和封建文人的作品。上世纪初在敦煌发现了几篇俗赋,但一般认为它只是文学史上的“个别现象”。我以为这同文言小说之外的白话小说反映了小说在民间的创作与传播一样,它反映了赋这种文体在民间的状况。文人之作自古著之于竹帛,代代相传,如地面的河流;民间作品往往自生自灭,如无文人采辑,后人无从得知,正如地下的河流,只有打了井或地层断裂,才见得清泉喷涌。所以,我们应尽量寻找其流传的踪迹,展示其在历史上存在的状况。因此,我们除在“唐五代卷”选了敦煌俗赋之外,此前各卷中也注意选俗赋类作品。“先秦卷”中我在《师旷》佚文和《晏子春秋》中各选了三四篇。我认为瞽矇和俳优同先秦赋的产生与传播有关。实际上,《师旷》辑本和《晏子春秋》中含有赋之某些特质之篇章不少,我初选出好几篇,最后反复比较,筛选出几篇较典型的篇目。此外,从《说苑》中选《雍门子周论以琴瑟》一篇,从《史记》中选出《宋元王梦神龟》一篇,以展现先秦时俗赋形成的状况。《论瞽矇、俳优在俗赋形成中的作用》一文,即是从史的角度论述这个问题的。该文是为伏俊琰同志的《俗赋研究》一书写的序。伏俊琰这本书是他的博士论文,有所修改。十多年前指导他写这篇论文时,我就曾联系《太子晋》和《史记·龟策列传》中“宋元王梦神龟”等说明俗赋在先秦时已产生的事实。当时也从个人的理解上对俗赋的几个要素谈过一些看法。

《历代赋评注》前四卷的“概述”是我写的,这便是《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汉王朝的兴衰与汉赋的发展及演变》、《魏晋赋的局限与拓展》、《南北朝赋创作的得失》。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折的,有时是迂回的,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状态。但严格说来,从来没有过完全的重复。文体的发展也是这样。赋的创作中

在某些方面进行探索与开拓,有时显得另一些方面好像是退步了,但总体上说或是开拓了它的题材,或是变化了体式,或是丰富了表现手段,或是对语言本身的表现美与形态美有了新的开发,我在这几篇“概述”中希望能揭示出这一点来。后三卷的“概述”分别是尹占华、霍旭东、龚喜平三位教授所写,讨论、定稿中我也参与过一些意见。《历代赋评注》这个大项目的完成,在我自己,对赋的认识也更深了一层,了解也更为全面。

前年贱庚七十,学生们借此在暑假聚会,有的人建议我将有关赋的文章加以结集。伏俊琰同志是首倡者,又是全国赋学会副会长,这工作便落到他头上。今已编为一集,并请全国赋学会新任会长许结教授和全国赋学会顾问万光治教授写了序。《楚辞》中大部分作品虽属辞赋的范围,但我已有《屈原与他的时代》、《屈骚探幽》二书,还有些论文,也将收入《楚辞锥指》一书中,此书未予收录。另外,《枚乘〈梁王兔园赋〉校议》(原刊《文史》2004年第4辑)、《赵壹生年考》(原刊《文学遗产》2003年第1期)、《赵壹生平补论》(原刊《中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已收入《古典文献论丛》(中华书局2014年1月第2版),且本书已收有相关论文,故亦未予收录。读者如对有关问题想作进一步深入的了解,可以参看彼书。

书编成一年多时间因我忙于别的事,另外因上海辞书出版社约我主编一部《历代赋鉴赏辞典》,想将此书编成、《前言》写就之后,再抽时间将《读赋献芹》从头看一遍,故一直未交出版社。

感谢许结会长和我的老朋友万光治在百忙中为本书写序。也感谢伏俊琰教授为编集此书费去了不少时间,几位博士生、硕士生为此书的校改费了不少精力。更要感谢顾青先生垂青,接受此书的出版,俞国林先生为此书的出版作了很多工作。

希望得到赋学界朋友的批评指正。

目 录

序一	许 结 1
序二	万光治 5
前言	11
论赋的特质及其与汉语和中国文化之关系	1
一、赋的形成同汉语特质之关系	1
二、从先秦至近代赋一直是很兴盛的文体	8
三、赋的各种体式一直处于消长变化之中	15
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	17
一、汉代赋的四种体式先秦时均已形成	17
二、屈原在骚赋、诗体赋方面的继承与创造	23
三、作为文赋滥觞的行人辞令与议对	34
四、由汉简、《师旷》看瞽矇同赋的关系	41
五、由汉简中的《晏子春秋》内容看俳优在俗赋形成中的作用	47
论瞽矇、俳优在俗赋形成中的作用	54
一、敦煌俗赋溯源	54
二、瞽赋矇诵与《师旷》	57
三、俳优在赋形成中的作用与《晏子春秋》	60
四、《俗赋研究》一书的成绩	64
《荀子·赋篇》包括荀卿不同时期两篇作品考	67
一、问题的重要性	67
二、五首鼯与侏诗的作时	67
三、侏诗即原《赋篇》之证	72
四、从古本《荀子》的篇数看《鼯》与《赋》合并之时代	74